

转轨中后期中国 市场的若干问题

吕 炜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殿和
责任校对：王肖楠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董永亭

转轨中后期中国市场的若干问题

吕 炜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星河印刷厂印刷

星河装订厂装订

880×1230 32开 7印张 140000字

2002年5月第一版 200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6300册

ISBN 7-5058-3014-7/F·2382 定价：20.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论转轨中后期中国市场的若干问题”。关于转轨中后期市场问题的研究，是基于“转轨经济”的定义、“转轨总过程”定义及阶段性划分基础上的，因此有必要为此提供一种背景资料。这便是将我曾发表过的《进入“后短缺时期”的中国经济》、《转轨经济的基本特征与研究方法探讨》两篇论文收入本书，而又只将其标明为“附录”的缘故。本书的最末一篇文章《记忆中的经济学故事或许与本书的诞生有关》，这本是基于本书写作完成之后的有感而发或未尽之言，由于在写作体例上有意保留了实话实说的质朴面目，与论文整体性风格无法一致，所以附加了“代后记”三字。

在“论转轨中后期中国市场的若干问题”的17个小节的若干处，涉及一些经济现象不好用现成概念进行表述时，笔者均采取了暂且使用“自定义”办法予以临时处理，并在行文过程中，对自定义的含义或详细或简略地有过说明。但是针对新提出的任何一个自定义概念

来说，即使是已经有过较为详细说明的那些自定义概念，也仍然是很不充分的，而“论转轨中后期中国市场的若干问题”的论述中心又决定了不能过多对它们展开讨论，故此只好将这一任务留在下一部专著《我的转轨经济学观》中去完成它。

正如笔者在“代后记”中所坦言的那样，本书或许根本就算不上一部严谨的学术之作，而不过是由若干经济学故事催动下诞生的一篇急就章而已。不足之处，错误之处，乃至十分荒谬之处，可能都在所难免。但有两点笔者是充满着自信的：一是未曾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去“嚼别人剩下的馍”；二是任何难听的批评都会听得进去，并能择其善者而从之。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

（辽宁大连，116025）

E-mail:weilu008@sina.com

吕 炜

2002年2月于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轨中后期中国市场的若干问题／吕炜著．—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5

ISBN 7-5058-3014-7

I．转… II．吕… III．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研究—中国 IV．F1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5609号

目 录

1. 关于本文题旨的一点说明·····	(1)
2. “热谈”大市场气氛中的几句“冷谈”·····	(6)
3. 地广、人众、资源多并不说明市场一定大·····	(12)
4. 外商为何要说“中国市场大”·····	(17)
5. “短缺阴影”挥之不去与市场分析的思维惯性·····	(23)
6. 市场判断差之毫厘会引致宏观应对失之千里·····	(27)
7. 市场大或小是可以有“标尺”度量的·····	(32)
8. “大中含小”是中国市场的现实特征·····	(38)
9. 多“二元”困扰将是转轨中后期一大难题·····	(44)
10. “储蓄过量漏损”将制约转轨中后期的市场·····	(53)
11. 更新转轨中后期市场观的理性思索·····	(62)
12. 转轨中后期市场机制主导下的政府·····	(68)
13. 转轨中后期的市场安全·····	(75)
14. “市场>计划”条件下的新发展观·····	(85)

15. “市场>计划”条件下的新投资观..... (99)

16. “市场>计划”条件下的积累与消费..... (112)

17. 结束语：归纳与延伸思考..... (123)

附录一 进入“后短缺时期”的中国经济..... (130)

附录二 转轨经济的基本特征与研究方法的探讨
..... (153)

记忆中的经济学故事或许与本书的诞生有关（代后记）
..... (195)



关于本文题旨的 一点说明

从1978年算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不可称之为漫长，但显然也不可继续称之为很短的路程。近几年来，尤其是针对1993~1996年经济运行过热进行治理的尘埃尚未落定，国内市场上商品供大于求矛盾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提前浮出水面以来，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经济体来考察，中国在市场化道路上究竟已经走出多远？未来还剩下多长的路程要走？还需要再花多长时间大体上才能告一个段落？

笔者注意到，在以上所说的这一个时期，无论从宏观经济运行层面或从企业、家庭对政府调控政策的反馈层面看，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仔细琢磨这些变化就会发现，它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对应着市场供需之间的某种变化，体现着与新的不均衡的某种内在联系。基于此，笔者便开始猜测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经

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列车，从1978年的那个起点开动以来，至此已经比较同步地越过了一个“转折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总过程开始进入中后期了？顺着这样的思路，笔者花了近两年时间进行专题研究，所得基本结论是两点：

（1）中国经济从增长角度看，已经由“短缺时期”转折为“后短缺时期”（从此角度看，政府对宏观调控的决策把握上，适宜于把宏观政策思维创新的着力点，从原来“反短缺”转向“反过剩”）；

（2）中国经济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已经由“计划型大周期”主导转折为“市场型大周期”主导（从此角度看，政府对改革开放的决策把握上，适宜于把改革开放思维创新的着力点，从原来“突破旧体制约束”转向“优化新体制结构”）。

围绕这两点看法，笔者写出了大约十余万字的心得，论述较为充分的是《进入“后短缺时期”的中国经济》、《转轨经济的基本特征与研究方法探讨》^①。随着对经济实践活动观察的继续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在长远和深层将受到怎样的波及、发生怎样的变化？在思维模式方面可能会存在哪些认识误区？这一层面的问题，在已经形成的文字中还基本未涉及。但从眼下现实情况看，这方面的认识误区还真不算少，似乎又未引起重视。例如，现在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所谓“中国市场”有多么大，以及

^① 参见《财经问题研究》，2001年第3期；《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84期。

境外如何看好中国大市场的热门话题。难道在“市场”这一问题上，就真有那么多人令人兴奋的优势，牢牢地被我们掌握在手中吗？

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本文的论题。

但是，本文论题虽然由此而立意，针对“热谈”中国市场之“大”的话题进行“冷谈”，不过是想以“破”作为正面阐述笔者看法的一个铺垫。在正面阐述笔者关于中国市场的典型特征基础上，针对转轨中后期中国市场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进行分析，才是本文题旨的第一层次的真正意义所在；本文题旨的第二层次的意义，则是在上述基础上，针对应在转轨中后期更新业已过时的原有市场观的问题，用更大篇幅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辨析。

笔者期望自己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所改进。即既不是完全遵照西方经济学的，也不是固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而是基于“转轨经济学”的。所谓“转轨经济学”，虽然目前尚处在“无学”时期，但并非就不能一边观察转轨经济过程、一边创立某些符合转轨经济运行规律的思维框架。笔者认为，转轨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只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经济”、“阶段性经济”，所谓转轨经济学，它与我们考虑中的那个最终成为替代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同义。因此，只要遵循着“计划化”→“计划>市场”→“市场>计划”→“市场化”这样一个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方式改变的经济制度变革发展过程去思考，适合于分析转轨经济现

象的模型，并非就无处可寻。例如将经济学视野纳入“计划→市场”的系统运动的观察中，同时又将观察的立足点建立在总揽“市场／非市场”的更高的观点上。笔者在论题重心选择和分析框架选择方面所作的这些大胆设想，在下决心做时，度量自身的学问功底，并非不诚惶诚恐。但笔者同时又认为，作为自少年时期即生活在这个大变革时代，并一直伴随着它的变革进程走过来的年轻一代的中国经济学人，理应主动担当起直接面对现实经济问题挑战的责任，尽可能使经济学思维观与时代同步而行、与时俱进，不成熟见解公诸于世后贻笑大方，不过只是个人有失脸面而已，何况在接受批判和被指出谬误过程中，还可以获得改进思维方法的机会。

关于中国市场的大小之争，本文所持观点是：中国大市场的典型特征是“大中含小”。但是如果采取创新思维，则可能从“大中含小”这一不利于市场稳定因素的背后，发现“小中隐大”的有利于稳定市场的因素，关键在是否建立了正确恰当的市场观。

关于建立转轨中后期新市场观的必要性问题，本文所持主要观点是：由于现有关于市场的全部认识是在体制改革初期萌芽，而随着体制改革进程逐步形成的，但在“反短缺”任务完成之前就已经基本定型。当中国市场上出现供给过剩问题时，本来就应把原有市场观当中的过时部分进行一次清理的，但“反短缺”取得胜利的信号，刚好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步出现，被搅在一起后，呈现出主次难分的情势，人们便忽视了市场观更

新的必要性。这之后，重大经济问题的挑战一个接一个，思索市场观这一层次的问题，显然基于学术成分重一些，也暂时还未被顾及。市场观建立得不恰当，首先会引起对市场容量的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不恰当，一旦估计失当，差之毫厘，将导致宏观调控取向方面的失之千里。此种“前车之鉴”如关于“笼中虎”之类的不恰当判断，它们事实上都与观察市场的立足点相关联。基于此，进行更新转轨中后期市场观的理性思辨，就不仅不应被视为一个冷僻的学术问题，而且还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

关于转轨中后期新市场观的内容，笔者在本文中理出了几个粗线条的东西。总的说来，它至少应包括转轨中后期“市场>计划”条件下的新发展观、新投资观、政府作用定位问题、市场安全问题、积累与消费问题等等。涉及相关方面的更为详细的讨论，显然就已不是在本文论题范围内可能完成的了。



“热谈”大市场气氛中的 几句“冷谈”

随着入世的到来，几乎每天都在听到关于中国市场有多么大的赞许声。

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是，中国有13亿人口，一人买一件产品，全国就是13亿件，市场规模之大，世界上独一无二。或言：中国某地区与某国的某州经济水平差不多，在经济起飞时期，某州的经济从人均GDP多少至多少的阶段，曾出现了持续多少年的经济腾飞的奇迹，那么在中国该地区也可做相似的乐观预计。进一步则推出：中国的经济与某国这一阶段的经济大体相似，据此便可以得出一条规律并用它估算中国从现在起，还会保持多少年的经济宽松环境。中国人口数量要比当年某国的人口多，中国未来的市场规模将会是该国后来所拥有的市场规模的多少倍。

诸如此类颇含“想当然”成分的谈论，笔者将其概

括为“想当然之想大市场”，尽管用心良好，却未必经得起推敲。人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从思辨层次说，只有两种渠道来提供其可能性，即如果不是从“假设被证实”过程中加以完善而来，就只能是从“假说被证伪”过程中受到启发，而从相反的方向得出了新的有价值的发现。

仔细研究一下人们认识真理过程中的“证实”与“证伪”之争会看到，关于认识的正误问题，并不只存在非此即彼一种形式，而是存在两种层次的“正”与“误”。一种是非此即彼层次的正误之争，其中的那个“误”，它的基本观点就是错误的。另一种正误之争，其中的那个“误”则非基本观点上的错误，换句话说，是因争论双方各自站在不同立足点上去观察同一事物，从而引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尽管双方原本是存在一些共同点的，由于各自后来都过分地将自己的论点任意夸大，并强烈地指责对方是“误”而己方是“正”，结果将共同点抹杀了。提倡政府做“守夜人”、听任冥冥之中那只“无形的手”操纵经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中的一大流派，同后来经济运行出现“滞胀”、“自由经济能使经济最好发展”这一命题受到质疑、以“凯恩斯革命”为标志的另一大流派之间的争论，笔者以为，就是基于最初或侧重强调市场效率内生变量自动调节优势、或着重强调市场效率内生变量自动调节的不足，而一点点扩大差异的。事实上作为市场经济效率的信奉者，他们并不存在南辕北辙的分歧。这一

点，从后来两大流派既在互相辩论，又在不断综合对方某些观点的行动上也可看出来。

人们认识和发现真理的过程表明，关于“正”与“误”的两种层次的争论，都有助于廓清人们的认识迷茫。试想一下：假若没有上述两大流派的争论，西方经济学哪会像今天这样异彩纷呈、洋洋大观。发生在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这20多年来的众多争论，有的显然属于基本观点层次的大是大非之争。例如关于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两个凡是”，还是“实践第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形态，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是处在应该消灭商品、货币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实践和经济学思维，与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借鉴和来自于那里的西方经济学思维的借鉴之间，是否水火不容？这一类的争论，事关重大实践和重大理论的前进方向，赞同者与反对者之间无共同点可以沟通。试设想一下，假若没有这些大辩论廓清认识迷茫，今天中国经济学人的观念和今天中国经济的现状，不就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面目了吗？当前，正是中国近2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前所未有地引人瞩目，加入WTO之后，关于“中国是个大市场”赞誉声正盛、出现频率最高、国人企望正高之时，笔者在这里提出若干相反意见与那些论点进行争论，按笔者的看法，这里面并无基本立场的经纬之别，只是思考问题的侧重点有所差异，或因“方法论”差异引出的各执一词而已。或许此时经济生活的主导现象，

在支持笔者所坚持的论点，而彼时经济生活的主导现象，则可能只支持与笔者所持观点相反的那些论点。经验证明，凡事多一种立足点总会比少一种立足点要好。当此“热谈中国大市场”之风正盛之时，来一点“冷淡”之声，恐怕也没有什么害处，至少对在“证实”与“证伪”之间为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多了一个不同的“观测点”来做“参照系”。

基于以上所言，这里就不妨针对“中国是个大市场”的命题来问几个问题。细而言之，“中国是个大市场”，这“大”究竟有多大？极而言之，“中国是个大市场”，这“大”究竟算不算“大”？“中国是个大市场”，在这个“大”字的内层、侧面、背后，可能还有些什么别的内容没有？如果有，哪类内容值得将来着重研究，哪类内容现在就得注意研究？面对外部对“中国是个大市场”的赞颂，取盲目乐观态度好些，或是持谨慎态度恰当？面对外部对“中国是个大市场”的挑战，急急推进全面改革、解决政府在这方面一直受到的指责、让中国经济市场化率达到100%、让私有化率过半之后，一切困扰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和妨碍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是不是就将迎刃而解？换句话说，有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就有了理想的社会状态了吗……

在关于“中国是个大市场”的问题上，决策层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静，某些媒体则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切，理论界谨慎乐观而侧重于中国经济体制及经济运行机制怎么样尽快让政府无效干预退出、努力促进市场化

率提高至理想程度。而笔者在开篇即已明确，本文只侧重对“中国是个大市场”的话题提出若干“冷谈”的思路。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世界经济运行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普遍看好经济持续增长的当今中国市场，十分合乎情理。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在当前特定时期的世界经济环境里，像中国这样地广人多、充满活力、潜力正显的市场，确实屈指可数。但笔者认为，如前所说，人家说“中国是个大市场”自有其原因，而作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我们自己则应当着重于另一方面，把问题想得复杂、周全些，以便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遭遇不测之变时，为决策层采取应对措施留下回旋余地。至少以下两层意思，在听到人家赞扬时，自己是首先就应该想到的：

第一层，中国市场目前格外引人注目，是否与全球市场上某些特殊因素有关？就是说，在人家所说的“大”里，是否可能包括着高估成分，出现了类似于“放大镜效果”的夸大？

试设想一下，假若世界上没有出现那样多的问题，或者“9·11”事件尚未发生，或者发达经济体经济不景气尚未严重到目前的程度……那样的话，人们对中国市场的估计，还会不会像现今这样看“大”。笔者在这里提出将某些特殊因素排除之后，再来对中国市场容量究竟有多大做出衡量，这种建议本身是没有什么错误的，更不是无稽之谈。它即是所谓“其他条件相同假设法”，